



科技卷 ②

总主编/卞孝萱
本卷主编/王前

神农尝百草

浅说中医中药

● 刘庚祥 著

神 农 氏 尝 药 辨 性

百草修膏寒热温平通造化



千方药著在臂表裹起沉疴

出版社

49
2

神农尝百草 卷②

神农尝百草——浅说中医中药

刘庚祥 著

辽海出版社

总 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物古迹，在科技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 4000 年。从秦、汉时起，中国就是统一的国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分裂是变态的，而统一是正常的。这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范围越来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伟大国家。

中国是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祖国。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现在，中国境内 56 个民族和衷共济，中华民族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情感广泛渗透于哲学思想、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心理素质、社会观念、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因爱国主义而集合了民族凝聚力，焕发了全民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青少年要抓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照这一指示，辽海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百科》。这套丛书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6卷，共100册，每册10万字左右。参加写作的，有年逾花甲的教授，也有风华正茂的博士、硕士，是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读者对象主要是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人士。因此，内容力求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立足于知识性和可读性，兼顾到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除了依据原始资料外，又吸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爱国主义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对此，要普遍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出版《中华文化百科》就是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了解先辈们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了解过去，有助于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努力使这套丛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读物，感染熏陶，潜移默化，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培养爱国主义感情，提高爱国主义的思想和觉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提高自身文化素质。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文化，是新世纪的伟大工程。我们全体编者、作者有幸能为这一工程尽微薄之力，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快慰。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指教，以便再版时改正。

编者

2001年3月

目 录

总序.....	1
一、植于文化土壤中的医学.....	1
1. 砭石本草中的医学实践	1
2. 巫术与朴素自然观下的医学	3
3. 阴阳五行范式与医学理论建构	8
4. 儒释道三教下的学术变奏.....	11
5. 儒学复兴与医学争鸣.....	14
6. 西学东渐与传统医学.....	19
二、取象比类的基础理论	23
1. 阴阳五行的理论纲领.....	23
2. 周流不息的气血系统.....	27
3. 援物比类的生理功能.....	30
4. 抽绎物象的病理探索.....	36
三、经验直观的认识方法	45
1. 望闻问切的经验直观.....	45
2. 从象到证的诊断方法.....	50
3. 参天悟地的方药辨析.....	57
4. 体质与证候.....	65
四、顺应自然的养生保健	71

1. 从原始舞蹈到导引健身术·····	71
2. 法于阴阳的养生之道·····	75
3. 百川交汇的延年养生术·····	81
五、文化撞击与中医学的未来 ·····	91
1. 近代中医的百年路·····	91
2. 文化变异与振荡·····	97
3. 中医药的海外影响与交流·····	104
4. 中医药学的未来·····	111

一、植于文化土壤中的医学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讲，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类能创造灿烂的文化，而动物则不能。可以说人类社会取得的一切成就，实质都是人类文明、人类文化的结晶。因此，这些成就都带有各自的文化烙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科学发现、科学成就都带有不同的文化印迹。中医学与西医学具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归根结底还是蕴育这医学的土壤——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1. 砭石本草中的医学实践

我国文化传说中的社会是处在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石器作为当时人类惟一的工具，不仅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发挥着有力的作用，而且还作为一种医疗器械用于治疗疾病。古代文献中“以石治病”的记载不胜枚举。当时用于医疗的石器谓之“砭”或“砭石”，主要用于刺破痈疡，治疗痈疽。如《素问·异法方异论》载：“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灵枢·玉版》载：“故其已成脓者，其惟砭石铍锋之所取也。”从出土文物来看，砭石形状不一，或锋或刃，其中有锋（尖）者，亦谓之石针，这石针就是我们今天针灸术中毫针的原形。今天的不锈钢针，正是在古代砭石、石针、

骨针、竹针、陶针等原始针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

植物药是人类最先发现的药物，对此中医学有千古传颂的“神农尝百草”之说，如《淮南子·修务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人们往往有一种用现有的文化知识去推论古代事物的习惯。一些考古证据证明，这种推论常距事实很远。可能也是拘于上述习惯，有人或认为当时的人由于“对自然界的极端无知”，因此要去尝试百草；或以为“神农尝百草”纯属传说，其“一日而遇七十毒”近乎无稽之谈。然而现代文化人类学者在研究现在还处于原始状态的落后种族的思想与文化时，却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如一位生物学家对菲律宾群岛的俾格米矮人有这样的描述：

“尼格利托矮人的另一特征是他们有极其丰富的关于动植物界的知识……尼格利托矮人完全是其环境中的固有部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不断地研究着自己周围的环境。我曾多次看见一个尼格利托人，当他不能确认一种特殊的植物时，就品尝其果实，嗅其叶子，折断并察验其枝茎，判断它的产地。”

“几乎所有尼格利托人都可以不费力地列举出至少四百五十种植物，七十五种鸟类，大多数蛇、鱼、昆虫和兽类，以及甚至二十种蚁类……的种名或摹状名。马纳纳姆巴尔，即巫医和巫医婆，在治病行医时经常使用各种植物，他们的植

物学知识确实令人惊奇。”^①

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进行另一种推论：古人，尽管是很早的古人，对具有上百万年历史的种族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并不是“极端无知”，百草也不是不可尝，这种“尝”实际是在观察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而且中药的药性理论，四性五味（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正带着这种“研究”印迹。这就是原始自然文化状态下的草石文化医学，它是中医学的起源，也是中医学文化的起源。值得庆幸的是，从砭石到银针，从“尝百草”到今日在中药理论中仍占重要地位的“四性五味”，体现出中医文化具有四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并具有良好的文化连续性。然而庆幸之余使我们想到：“既然今日神农子孙都已飞上蓝天、跨越四海，那么不应该由神农的后代用现代方法、现代仪器来重新尝一尝这些草药吗？事实上神农的后代正在做这类事，不过有的人说《内经》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治不法天之纪，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有一种“能而不为”、崇尚自然、保存国粹之感。有的后代则要更名改姓，在医学上全盘西化，将传统医学视为“旧物”、“非科学”而抛弃，还有一部分人则在这“新”与“旧”，东与西的两极振荡之间承受着震动。

2. 巫术与朴素自然观下的医学

法国社会学家路先·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的俄文版序言中写到：“如果考虑到地球上人类的悠久，那么，

^①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第7页。

石器时代的人就根本不比我们原始多少。”同理，今天的现代人同仅先于我们三四千年的夏商时人相比，若去掉文化的因素，几乎就是两块相同的“白板”，之所以存在思想与认识上的不同，主要与我们脚下这块文化土壤的肥沃与积淀有关，因此古代的文化与现代文化、文明，只存在程度上的高低之分，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的祖先由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同我们现代人一样从事着两大文化创造活动。一是物质的，围绕着生存与生活的文化；一是精神的，与人的心灵、精神需要相关的文化。前者后世则发展成为科学技术；后者则发展成为宗教及准宗教或类似宗教性质的意识形态。这种精神文化是人类意识活动的必然结果，人有清醒的意识，逻辑的思维，必然要对周围自然现象的千变万化去思索，对不能理解的事物去猜测，面对奇妙的自然周而复始的不停运转，很容易使人想到在这自然的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天帝在主宰。因此有了神及鬼的概念，有了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神职人员，如“大祝”、“大卜”和“司巫”等来掌管祭祀祈祷、占卜吉凶和医治疾病等宗教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医学带有浓重的巫术色彩，如殷商甲骨文中就有许多是问卜疾病的卜辞，“武丁病齿，祭于父乙，以求赐愈”，“武丁病舌，祈于亡母庚”。对于疾病，当时认为或是鬼神作祟，或是祖先“作它”，于是针对情况或驱鬼神以体外，或祈求祖先宽宥、保佑。并逐步发展成“咒禁”、“祝由”等法术。用这种法术来医病，甚至可以使扶着来的、抬着来的病人立刻痊愈。（《说苑·辨物》载：“吾闻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輿而

来者，皆平复如故。”）《素问·移精变气论》也曰：“余闻上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祝由便是巫术在这上古医学中的具体体现，然祝由作为国家医学十三科之一，一直延续到明代，作为影响时至今日仍在我们的传统习俗中存在，如本命年系个红腰带以避邪，端午节门槛上挂鲜艾以避瘟疫，可见巫术对中医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巫术对医学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利用巫术曾治愈了一些疾病，而是巫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曾向各个领域渗透，作为文化，巫术不仅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产生，而且是当时人们争取生存、求得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是当时人们创造精神文化，表达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观念的惟一手段。因此巫术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坏，至于巫本人因为他未曾将他的法术与现代科学相比较，所以他也不知道他的一些行为是谓欺骗。进一步深入分析，巫术往往幻想依靠某种力量或超自然力，对客体施加影响和控制，以求人们更好的生活和生产，因此其思想中也包含有进步的因素。然而时至今日，如再放弃科学去相信巫术，那是极其愚蠢可笑的。

当人们用心灵去构建这原始宗教，并虔诚地相信着巫术的时候，也注意到实践中巫术往往并不灵验，虽然对此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科学却一天一天地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迫使人们把心灵的目光转向那广阔的自然。把这浩瀚的自然界究竟是由什么来构成，什么是这自然的起源作为问题的焦点。于是“气”的概念在人们的心灵里产生、深化，认为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物质，包括人在内都是由这气变化而来，由这气构成。如《管子·内业》认为：“气者身之充也”，“凡

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古人把“气”作为一种物质看做是世界的本原，表现出古人朴素的自然观。既然人、自然万物都是气所构成，那么人与自然的天地，也就必然有着以气为媒介为纽带的联系，因此“天人相系”、“天人相应”的思想就开始萌生。医学也开始在鬼神之外寻找病因，如秦国名医医和为晋侯视病，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左传》）并对以“祝”驱病产生异议，如公元前522年，齐景公患间日疟近年不愈，有人归咎于祝史祈祷不诚，当杀之。对此，齐大夫晏婴认为，病愈与否不在于“祝”，指出景公之病，实源于“纵欲厌私”（沉溺于女色）、“撞钟舞女”、“暴虐淫从，肆行非度”，与鬼神毫无关系（《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他如荀子、韩非子等更明确地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巫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即认为人的病与不病在于人自身的养护，而依靠占卜、信奉鬼神则更易患疾病，可亡也。

当人们把心灵的目光转向自然，透过现象去探测自然背后的本原的时候，当人们猜测并认为构成我们的肉体、整个世界是一种“气”的时候，就开始对这种“气”的性质、结构、关系进行天才的思辨，因此以物质为第一性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开始萌生。

首先人们认为作为自然界诸物质本原的“气”在性质上有阴阳之分，阳气具有光明、温暖、向上、主动的性质，而阴气则有黑暗、寒冷、向下、主静的性质，并进一步指出世间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其根本原因都是内在阴阳之气的交

互感应与消长之结果，于是乎关于陨石坠落、土壤变化、震雷的发生等都是阴阳变化所致，“陨石于宋……是阴阳之事”（《左传·僖公十六年》）；“阳瘳愤盈（阳气盛满），土气震发；……阳气俱蒸，土膏（膏：土壤的精华、肥力）其动；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国语·周语上》）。于是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出（《管子·四时篇》）；“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说明阴阳变化规律的学说亦见。

“五行”学说认为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由五种物质——木、火、土、金、水的变化而构成，“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国语·郑语》）。因此五行说与阴阳说一样代表着原始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从古代的历史资料来看，五行说的源起比阴阳说要早，作为一种民族文化思想在社会中的普及、深入也胜于阴阳说，从内容来看，阴阳与五行是在同一种朴素的自然观下对世界的本原、构成及变化的两家学说、两种观点，因此于先秦两种学说一直并行而不悖，并且能相互补充，相互完善，这就使以后两说合一，形成阴阳五行观成为可能。

阴阳、五行原始文化大概念的建构为当时处在宗教、巫术中的医学输入了新的血液，带来了新的曙光，于是秦医医和有“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左传·昭公元年》）的认识，有“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过度、过亢的六气则导致疾病的发生）”（《左传·昭公元年》），即从自然界的“六气”来寻找病因的观点，《周礼》更有“天有五星，故有五行，以为寒暑，以为阴、阳、风、

雨、晦、明，分为四时，序为五节，淫则为裁”的论述。

总之，于先秦，阴阳与五行作为建立在朴素唯物自然观下的文化概念，不仅深深地渗透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土壤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的营养，这营养不仅使中医学从秦汉时起就表现出一种集传统文化大成的气概，而且使中医在后来的道路上始终与文化有不解之缘，以致“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及后来仕途无望的知识分子，转而学医成为可能。

3. 阴阳五行范式与医学理论建构

阴阳与五行，原初都具有世界本原的意义，经过先秦纷争之后，本原之意归于“元气说”之下。如前所述，先秦阴阳与五行是两种并行的学说，两者并无必然联系，在春秋以前，常常是言阴阳者不谈五行，论五行者则不述阴阳。直到战国的中后期，邹衍才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即“邹衍深观阴阳消息……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这里的“五德”就是五行，因此邹衍是第一个将阴阳五行联合成理论体系的人。邹衍一方面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自然现象；一方面用以解释朝代兴衰更替的社会现象，具有很好的普适性，尤其受统治阶级的重视，因此这种学说一方面成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哲学，一方面成了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范式。中医学是受阴阳五行说影响最大，而且把阴阳五行说运用得最好的学科。

虽然在邹衍之前阴阳与五行学说就已被引入到医学之中，但把阴阳五行联系起来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理论而引入

医学的却是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内经》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当时医学的理论框架推到了一个纲领性的高度，“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①对人的生与死，健康与疾病，及病证性质、治疗等都用阴阳学说来说明与阐释。五行学说则作为一种朴素的系统论将人与自然事物进行了全方位的类分归属，并以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各自涵概的性质与功能去诠释类分的事物，如类分中人体五脏的肝属木，时令的春属木，五气的风属木，五色的青属木。因此人体的肝通过木的类属就与春、风、青等有某种性质上的同一，或者说，肝于四时主春，即肝气春天旺盛；肝主风，肝气旺盛易产生“风动”之象（振、摇、眩）；肝主青，肝病时病人面色发青。五行学说这种类属的逻辑分析、归纳方法为中医学开辟了一条与西医讲定位、讲结构、讲因果等完全不同的认识路线，步入了另一种认识论的世界。五行学说不仅根据五行的属性来分析人的生理、病理现象，而且还以一种生克关系，使五行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系统观。这种系统观落实到人体五脏上，就使五脏成为一个系统，脏与脏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性质与作用，这就是中医生理学中脏腑学说的理论基础，所以中医生理学的脏腑学说是五行学说的发挥与运用，至今仍对中医临证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世界医学史上医学受社会文化之熏陶，汲取文化中的

^①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6月版，第31页。

营养是一种必然现象，然而中国秦汉时期的医学，可能是当时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也可能是医学发展要急于超前、迅速建构起自己的理论系统，因此采用了在世界医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从人文领域移植理论学说的现象。如成书于东汉的中医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在分类药物时仿照社会的等级制度按药物对人体的作用，将 365 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在方剂上，制定其组方原则，即“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①就是说在组成一个方剂，一个药方的时候，药物之间要有一种关系，即君臣佐使的关系。这种君臣佐使之学完全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政治学的学问，或者说是维护统治权力的经验，把这种治人的政治经验引入到药物具体的组方之中，按理两者不应有共同之处，然而使人意外的是这种君臣佐使说，二千年来在中药组方方面一直作为基本的原则被遵循，被运用。除此之外，《神农本草经》还摹拟人际间的几种常见关系，提出药物配伍，即配合运用的“七情和合”理论，以及《内经》脏腑学说中的“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②等，都带有明显的封建社会人文文化的烙印，足见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均以各自的形式对科学技术进行着哺育和蕴育，并产生着久远的影响。

① 《神农本草经》，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 1 月版，第 129 页。

② 《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典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 6 月版，第 58 页。